

典则：一个诗人沉醉在故宫文华殿

高 昌

我是为“典则”而来的。唐人窦蒙说：“从师约法曰典，可以传授曰则。”这句话，就印在展览入口处。

九月，故宫，一个澄明的上午。阳光低低地掠过琉璃瓦，洒在朱红的门扉上，清亮而温煦。我走进文华殿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浩瀚的、无言的、由纸与绢织成的璀璨星座。

“典则：唐宋书画展”分为两期、五个单元，绝大多数是一级文物。我看的是第一期——唐、五代时期的作品。从“东晋南北朝：典则初立”，到“隋唐：法度恢弘”，再到“五代：承唐启宋”……一路徜徉，沐浴着辽阔而深沉的文明光辉，我这个后学末进的当代诗人，唯有沉醉。



晋 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(宋摹本)局部

一

第一件与我照面的，是褚遂良《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》卷。隔隔水处，明项元汴题签“褚摹王羲之兰亭帖”，字迹清雅。我注意到诗人范仲淹的题跋，一笔一划，字字郑重。连放诞的米芾在帖后的题跋，也不是惯常的八面出锋笔法，而是端肃地逐笔写来，透着一份虔敬之意。

王羲之永和九年那场醉后的挥毫，确立了行草范式，开辟妍美新风，只是可惜真迹湮灭于岁月风雨。我们今日所见，皆为摹本，是后人隔着漫漫时光的遥遥致意。而褚遂良的这卷摹本，确为摹本中的精品。他摹的不只是字，而是一个久远的春天——那群诗友一觴一咏，留下对生命与青春的浩叹，也留下书法史上的一段难忘逸事。

所谓“典”，是褚遂良从王羲之那里学来的笔法；所谓“则”，是他把这笔法传授给后人。范仲淹的郑重留言、米芾的端肃题跋，不正是“则”的延续吗？这份郑重和端肃，是“典则”至深的尊严。它不是死的规矩，是活的流衍。

我站在文华殿，像站在一条河的下游，看见上游的活水，缓缓在流。

二

第二件，是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卷。画的是诗人曹植与洛神相遇、相恋、离别。卷头有乾隆的《题顾恺之洛神图》：“赋本无何有，图色即空。传神惟梦雨，拟状若惊鸿。子建文中俊，长康画里雄。二难今并美，把卷拂灵风。”

我在画前驻足，看洛神在水上翩然远去。曹植垂袖而坐，目光含愁……啊，洛神！一个永远追不上的幻影，一个词语无法抵达的远方。她就藏在那“高古游丝描”的绵长线条里，藏在那一抹褪了色的苍翠里，成了一种“典则”——这是所有美好事物终将消逝却也因此而永恒的真义。

据说，这一画卷也是宋摹本。可我想，宋人摹顾恺之，不也正像我们今日隔着时光去读宋人吗？天地悠悠，总有一份美好，值得这样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反复地、郑重地回味与怀想。

三

第三件，是旧题韩滉的《文苑图》卷。画上是四位诗人在王昌龄江宁县丞的琉璃堂古松下唱和吟咏。一人倚松凝神，一人抚石寻句，一旁有童子研墨。左边另有两人闲坐石凳，摊卷交谈。形貌、气度，都生动鲜活，神采飞扬——尽管我猜不出哪个是王昌龄，哪个是岑参，哪个是刘眘虚，哪个是李白。

画家画的是“文苑”，是文人的欢聚，是诗人灵魂里的原乡。恰恰是这个寻常的瞬间，成了“典则”，融入那些散淡的、温柔的、缓慢的时光里。画中人的神情，有一种专注的松弛和从容——诗在心头，人在世间。

四

第四件，是传为唐代陆曜所作的《六逸图》卷。画的是汉晋间马融、阮孚、边韶、陶潜、韩康、毕卓六位高士的逸事。人物造型古拙，神色闲畅，线条细劲，设色清雅。他们都是“逸”——逃出尘世常轨的人，活成自家模样的人。六个面目，六种活法。我最喜欢的是诗人陶潜，卷上画的是“葛巾漉酒”的美好一瞬。体胖有须的五柳先生科头袒腹地坐于地上，双手正持着葛巾，专注地等待着童子把酒瓮中的酒液倾倒下来。陶潜的光脚旁边放着毛笔和正在书写的诗稿，所题正是《饮酒·其五》，只是将“悠然见南山”写作“悠然望南山”，“欲辨已忘言”写作“欲辨已无”（“言”字脱漏），与现在通行版本稍有不同。

《六逸图》中的其他逸人或坦卧吹箫，或吹火蜡屐，或腹笥昼眠，或辞招卖药，或瓮下盗酒，各有风采，气度不凡。这也是一种“典则”吧？它不宏阔，不显赫，不“从师约法”，不“可以传授”。比如陶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，比如毕卓“右手持酒后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”……他们仿佛在说：有一种“典则”，非由授受，却出于抗拒。抗拒被传授，抗拒被驯化，抗拒成为他人眼中的“典则”。这种

“抗拒”，本身就是一种更幽深的“典则”。

五

第六件，是杜牧的《行书张好好诗》卷。唐大和九年（835年），杜牧为旧识歌女张好好的遭际所动而写飘零、写歌哭、写聚散，笔势起落如低咽、如长叹、如悲吟……和我一起参观的一位书法家，评价杜牧墨迹线条拘谨，认为相较而言，终归是文人字罢了，不如历代书法大佬那般挥洒自如。但作为杜牧的诗人同行，我却对墨迹生出一种异样的感怀与怅惘。杜笔的顿挫抑扬，不正是写到“怪我苦何事，少年垂白须。朋游今在否，落拓更能无”之时，喉间那一瞬的无语凝噎么？

杜牧写了那么多诗，可他的书法，只有这一卷留了下来。这里有一个鲜活的、有血有肉的杜牧。不是因为它契合了某家书体，而是因为它无从取代。

杜牧书法的拘谨，或许恰恰是另一番诚恳。而这份诚恳，在千百年后，依然有人领会和回应。墨卷的末幅，就是近人张伯驹先生的题跋。一首《扬州慢》，宛如一场隔世的酬答：“秋碧传真，戏鸿留影，黛螺写出温柔。喜珊瑚网得，算筑屋难酬。早惊见、人间尤物，洛阳重遇，遮面还羞。等天涯迟暮，琵琶溢满江头。盛元法曲，记当时、诗酒狂游。想落魄江湖，三生薄幸，一段风流。我亦五陵年少，如今是、梦醒青楼。奈腰缠输尽，空思骑鹤扬州。”张先生因为收藏杜牧墨迹自号“好好先生”。1956年，他将《张好好诗》卷捐赠国家，入藏故宫博物院。他的这篇跋词，令我动容的是这样两句：“我亦五陵年少，如今是、梦醒青楼。”他显然是把自己也放进文字里了。他不再是那个富家公子，而是一个同样历经盛衰、拥有过也失去过的人。那些隔了光阴的、追不回的遥望，说到底，都是同一个梦：对美好之物的眷恋，对逝去之时的怀想。而这眷恋与怀想，恰恰是“典则”最动人的温热。

六

还有几件与诗人相关的墨迹，各自带着一段诗心的回响。

欧阳询的《张翰帖》，写的是西晋诗人张翰的逸事。张翰因见秋风起而思念吴中莼菜、鲈鱼，遂弃官归乡，“莼鲈之思”也由此成了后世士人挂冠归去与故园之思的经典意象。欧阳询以刚健峭拔的笔力，写下这段轶事。一个诗人因一种诗意的冲动而名传后世，一个书法家又以笔墨把这段奇异经历定格下来。所谓“典则”，有时候就是这样——一个刹那的、沉实的定格吧？

杨凝式七十六岁时所书《行草书神仙起居法帖》卷，则是五代乱世里的一缕萧散出尘之气。杨凝式“长于诗歌，善于笔札”，相传“遇山水胜概，辄流连赏咏，有垣墙圭缺处，顾视引笔，且吟且书”。这件《法帖》记录的是从焦上人尊师处所得的起居养生法，笔势纵逸，章法跌宕，法度谨严，格调奇崛。诗、书、养生，浑然一体。他自信地吟唱“行之不厌频，昼夜无穷数。岁月积功成，渐入神仙路”——乱世里的人，把肉身当作最后的丘园来耕种。

另外，传为颜真卿手书的《湖州帖》也赫然在目。此帖为一通信札，讲述湖州地区发生水灾、百姓得到安抚一事。但也有专家认为是宋人仿本。颜真卿书名很盛，这通书札与诗人身份牵连不深，但《全唐诗》特别收存颜诗一卷。前人称赞“悉综古调，颇尚格气”“旷世之情，优入三昧”，颜真卿确实是一位诗人。一个能把水灾写得如此平实的人，一个能被后人仿得如此传神的人，他的“典则”，也许就落在这份平实里，也落在这份传神里。

七

走出文华殿时，已近正午。琉璃瓦上泛着一层薄薄的金色。天很好，蓝天上飘着几朵素洁的云彩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文华殿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如一册刚刚合上的旧帖，无言而安然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看了这一上午，究竟什么是“典则”？“颜筋柳骨”也好，“颜张醉素”也好，雄强、恢宏也好，典雅、精致也好，这些典则都不是表面上的“流量”数据，而是向上承续古人的智慧、向下绵延文脉的薪火。其中有对真实的表达，有对美的追寻，有对人的感喟——纸会朽，墨会淡，可它承载和倾吐的情愫，是不朽的。那些画者、书者、诗人不倦地画着、写着、唱着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否成为“典则”，却只是孤独地、笨拙地、恳切地、坚持地做着自己罢了。

最后，我写了一阕词，聊记所见所感。

南乡子·观“典则：唐宋书画展”

秋日访文华。满壁琳琅簇异葩。一脉江河源汨汨，淘沙。典则原从烽燹赊。

残楮记烟霞。聚散人间真质靡。千载如瞻松上月，堪嗟。圆缺晴阴国与家。

（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品，由作者拍摄）

从钱塘江出发，沿浙东运河经萧山、绍兴至上虞，转曹娥江，再溯古剡溪，经嵊州、新昌而天台、临海、温州，以及余姚、宁波、东海舟山……千百年来，众多文人墨客循此水脉，一路行吟，造就这条光耀千古的浙东唐诗之路。

浙江新昌，古属越国剡中之地，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所在。东晋以来，高僧名士，隐居栖止；唐宋以降，墨客文人，盘桓驻足……集山水形胜与千年诗韵于一地，新昌可谓得天独厚。

“夫有非常之境，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。”魏晋时期，剡地“两火一刀可以逃”，成为中原士族躲避战乱、隐逸遁世的偏安之地，大批高僧名士纷纷入剡，流连于剡东灵山秀水之间。高僧支遁买山而隐，立寺行道；书圣王羲之栖隐剡东，修习黄老……及至唐代，众多诗人或“自爱名山”、探幽访胜，或“追慕先贤”、问道朝圣，他们自钱塘而下，一路载酒扬帆、翰墨寄怀，在浙东大地留下无数精彩华章。谢灵运、李白歌吟天姥云霞，杜甫、方干难忘剡溪秀异，茶圣陆羽、茶僧皎然考茶咏茶，皎然有“越人遗我剡溪茗，采得金牙鬻金鼎”之句，剡溪茗香自此名动诗坛……宋代，新昌兴学重教，经世致用之风日渐盛行。石整、黄度、俞浙等理学名家与朱熹、叶适、陈亮等博学鸿儒交往密切，留下大量诗文遗迹，成为新昌宝贵的文化遗产……

山水因胜迹而名扬，胜迹因人文而显世。新昌位于天台、四明、会稽三大山脉交叉盘结之区，沃洲、天姥、石城、南岩、穿岩等名山环布其中。层峦溪壑，化作诗人寄怀抒思的载体，催生诸多动人诗篇。

“东南山水，越为首，剡为面，沃洲、天姥为眉目。”唐大和六年（832年）夏，时年61岁的白居易写下了《沃洲山禅院记》。在白居易看来，沃洲山之所以能吸引高僧名士，是因为其“非常之境”；而白寂然能在数百年后重兴此山，是“时有待而化有缘”。

沃洲山在新昌县城东南12公里处，晋代白道猷（亦称帛道猷）、竺法深、支遁等高僧皆居于此，戴逵、许询及王、谢诸姓等十八名士与之同游，史称“沃洲胜会”，堪与庐山白莲社、山阴兰亭会同称文化盛会。山有灵澈锡杖泉，西南的养马坡、放鹤峰，皆因支遁得名。据文献记载，支遁好养马而不乘，有人讥笑他，他却说：“贫道重其神骏。”又有好友闻支公好鹤，以双鹤相赠。支遁非常爱惜，怕幼鹤飞走而剪其双翅。幼鹤“反顾翅垂头，视之如有懊丧意”，支遁有所悟，大发感叹：“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乎！”等到幼鹤的翅膀重新长出，支遁放其凌空而去。白道猷、支遁等皆有以新昌山水为题的诗文，白道猷之存诗《陵峰采药触兴为诗》，写的正是沃洲山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谢灵运以“嘏投剡中宿，明登天姥岑”的千古绝唱，启中国山水诗派先河。谢灵运有《游名山志》残本谓：天姥山上有枫千余丈，萧萧然。天姥山声闻朝廷后，图于“元嘉团扇”。此后，“元嘉团扇”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代名词，而天姥山则成为中国山水画肇始的历史文化名山。

道家七十二福地中位列第十六的天姥山，古称天姥岑，位于新昌县城东南50里，东接天台华顶，西北连沃洲山，孤峭挺拔，苍然天表，为一地之望、众山之主。西晋张勃所撰《吴录》记载：“剡县有天姥山，传言：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。”是为现存最早记载天姥山的文献之一。当年，李白、杜甫等唐代诗人追慕前贤足迹，游历于此。据统计，游历浙东唐诗之路、行吟剡中天姥的唐代诗人，有名有姓的多达450余人，约占《全唐诗》收录诗人的1/5。

2016年，新昌动工建设唐诗文化园（鼓山公园），2018年建成开园。如今，唐诗文化园不仅是新昌山水品质之城建设的“点睛之笔”，也是唐诗之路上一个地标式主题公园。园中最高处的天姥阁净高31.5米，与天姥山遥相呼应。乘梯而上，近看

旧城新貌收眼底，远眺天姥主峰拨云尖，“天姥连天向天横”的雄浑气势畅然于胸。

在新昌县城东南15公里桃源乡境内的刘门山，居沃洲、天姥间，群山攒簇，烟雾迷离，因刘、阮遇仙故事而闻名，《幽明录》《齐谐记》等皆有记载。至今，刘门山还有保存完好的刘阮庙、采药径、惆怅溪、迎仙桥等文化遗迹。后世诗人也多咏刘门山其景其物其事，仅唐代就有白居易、元稹、皮日休等诗人留下20余篇诗作。

因山岩围绕如城而得名的石城山（今名大佛寺山），又名南明山。东晋永和初年（345年），高僧昙光创寺于此，支道林亦葬于此山。现存的千佛与石弥勒为南朝古迹。隋开皇十七年（597年），智者大师途经石城大佛寺，圆寂于此，石城山也成为天台宗的第一门户。至今，石城山仍是游客来新昌的重要目的地，每年前来瞻礼者不计其数。

盛唐时期，孟浩然游览石城，率先将“剡县石城”写入唐诗，其《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》有“石壁开金像，香山倚铁围”之句。其后，刘长卿、元稹、杜牧、罗隐等多有咏赞。王羲之书“鹅”的故事也发生于此，“鹅”字碑为神州多处古刹所仿刻，名扬天下。

“知住南岩久，冥心坐绿苔。”（齐己《山寺喜道者至》）位于新昌县城西7公里处的南岩山，山岩陡险，壁立千仞，是史学界公认的“海迹神山”。南岩山历经沧海变迁，至今流传着大禹治水、任公子钓鳌等历史传说，胜迹有南岩寺、任公子钓台与化云洞等。李白等许多唐代诗人都曾来过这里，李绅《龙宫寺碑》记其“南岩海迹，高下犹存”，诗亦有“南岩寺，本沧海，任公钓台今尚在”之叹。

距新昌县城东南20公里的东岵山，又名远望尖，西接鳌峰，南联沃洲，脉自菩提峰来，遥接天台华顶，素以南朝佛教圣地著称。东晋咸康年间，高僧竺潜来此结茅建寺，其高足竺法友、竺法雍、康法识等皆卓锡于此。至南宋，朱熹游东岵水帘洞，有“一片水帘遮洞口，何人卷得上帘钩”之句，至今传诵。

“虽非仙人居，恰是仙人地。”清代袁枚《斑竹小住》诗中所咏的仙人地，正是新昌县城东南15公里会墅岭麓的司马悔山，因山多斑竹，又称斑竹山，为道教第六十福地。其隶属天姥山脉，山中有司马悔庙，庙前有一石桥，名司马悔桥。明成化《新昌县志》载：“旧传司马承祜隐天台山，被征至此大悔，因以为名，窃谓此当为处士轻出者戒。”

东晋高风远，南朝圣迹南朝寺；盛唐翰墨香，一路风光一路诗。浙江新昌，因山而名，因诗而兴，因时而新。这里山水灵秀，这里人灵地杰，这里播芳六合。



沃洲湖（今长诏水库）

化研讨交流升级而来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相聚于此，围绕关公文化的精神源流、文物遗存考据、当代传播实践展开深度研讨，打通学术研究 with 大众传播的边界，为关公文化创新发展赋能蓄力。

历经1800多年积淀，关公文化承载的“忠义仁勇”早已跨越时间和地域，成为海内外华人情感联结的精神纽带。作为“关公故里”，近年来，运城面向全球共建“关公文化交流基地”，全力推进“关圣文化史迹”跨国联合申遗，精心打造关公数字展馆、关公文化博物馆，让古老的关公文化持续焕发时代光彩。

运城是山西省重点打造的旅游热点门户城市之一，当地确立“文商融合旅游热点门户”发展定位，依托丰厚的国宝家底，统筹关公文化、池盐文化、黄河文化、根祖文化协同发展。当地推进“国保开门”工程，全力推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不局限于传统观光游览，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、数字短剧、研学游学深度结合。培育夜间市集、露营休闲等消费新场景，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到访，把网络热度转化为地方产业实实在在的发展收益。

如今，关公文化早已深深镌刻进运城的城市肌理。借助节俭会搭台、学术深耕、产业落地，这座城市守住历史遗存，持续探索传统文化对接当代生活的路径，沉淀千年的忠义精神，在当下持续释放新的影响力。

（图片均由活动方提供）

山西运城：“关公故里”向新行

晋 文



开幕式现场

搭建起两岸文化交流的全新载体。现场为关公文化旅游品牌推广大使授牌，正式发布“见英雄”关公文化数字艺术巡展，进一步拓宽关公文化传播路径。开幕式上，关公文化交流基

地授牌、第二批入驻“祖庙祭堂”关公庙宇授牌、首期台湾青年研习营结营等项目有序举行，非遗铜雕关公文创、“千秋忠义启河东”关公文化溯源文物主题游径同步首发。这场盛



游客在解州关帝庙参观游览

会，既是运城本土文化实力的集中展示，也成为面向海内外开展文化对话的重要窗口。

与旅游节同步启幕的还有首届关公文化论坛。论坛由运城连续举办10年的关公文